

王仲良紀念文集

徐匡迪題



王仲良纪念文集

浙江省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委员会
慈溪市匡堰镇人民政府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仲良纪念文集/浙江省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等编.-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2
ISBN 7-80136-223-3

I. 王… II. 上… III. 王仲良-纪念文集 IV. K8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548 号

王 仲 良 纪 念 文 集

浙江省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委员会
慈溪市匡堰镇人民政府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北门)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250 千字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50 册

ISBN 7-80136-223-3/K · 194

定 价:26.00 元

目 录

真正的共产党人(代序).....《王仲良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1)

纪念文章选辑

怀念狱中战友王仲良 叶进明(15)

薪火犹传人间(诗两首) 张忍之(20)

王仲良无锡工作片断 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 汤煜琴(21)

我的革命引路人王仲良同志 沈云章(28)

往事与回忆(节录)..... 陈枕白(36)

怀念良师益友 尤 旭(43)

土地复耕的开拓者 王虞堂(47)

争取改造地方游击队 壮大党的武装力量 许海泉(53)

王书记指引我们部队脱离“忠救”参加“江抗” 张卓如(57)

怀念战友王仲良同志 连柏生(61)

王仲良同志的“总结” 朱人俊(62)

坚持三北敌后 建立不灭功绩

——追念仲良同志 徐 放(65)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仲良同志 丁公量(70)

学习王仲良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 谢仁安(77)

可敬的先辈 戚铭渠(81)

一次深刻的革命气节教育

——忆仲良同志的一席话 张 光(88)

想念在梦中 虞天石(91)

我一生追求、学习的榜样	田 井(95)
三个基层干部的追忆	陆子奇 方 克 叶 新(102)
家乡人们怀念您	中共慈溪市匡堰镇委员会(113)
我在三北地委机关工作的日子里	宣亚静(116)
感谢王政委的两次批评	沈一民(119)
小忆王仲良同志对敌伪军工作点滴	陈 阜(124)
他活在警卫战士的心中	徐 敏(126)
警卫首长的日日夜夜	周龙保(132)
怀念与追思	
——忆王仲良同志	高忠坚(137)
王仲良同志三次故乡行	王春泉(143)
永恒的引路人	王乾德(151)
记王仲良同志在一纵教导团	陈 阜(156)
悼王仲良同志(诗一首)	陈 阜(158)
回忆王仲良同志在华野卫生部工作的	
二三事	耿希晨 李树森 尹 星(159)
王政委的涵养真了不起	张 祥(163)
王政委对我的教育	向 进(165)
深切的怀念 学习的榜样	胡永畅(168)
共产党人的楷模	殷宏章(174)
王仲良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	张香桐(177)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	沈善炯(180)
回忆王仲良同志	王德宝(184)
民主党派的诤友	嵇汝运(186)
1960年整风和“神仙会”	桂世茂(188)
党建工作的典范	
——追忆王仲良同志对中科院上海分院党	

的贡献.....	巴延年(192)
宽厚的长者 亲切的教诲.....	王芷涯(205)
心系科学家的好领导	
..... 陈允新 杨 逸 刘泽蔚 薛成君 万钟汉	(210)
一个秘书眼中的院党委书记	叶苏香(214)
他实事求是地贯彻了党的科研路线	
..... 罗 澄 姚 鑫 王亚辉	(218)
发生在冶金研究所的三件事	金大康(223)
敢于实事求是的人	杨殿陞(226)
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高 棻(228)
感谢王仲良同志对我的“包庇”	于宗瀚(231)
当我被打入另册时	徐 科(236)
忆仲良	钟少白(239)

遗著选辑

革命、被捕和狱中入党	王仲良(249)
我在江南工作和虎口余生记	王仲良(255)
我到浙东工作的一段回忆	王仲良(264)
王仲良同志在三北地区敌工工作扩大会议上	
的报告(1944年6月13日)	(267)
王仲良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	
报告开会意义(1944年7月1日)	(286)
王仲良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上	
《关于三北地区武装工作的报告》(1944年7月4日)	(288)
王仲良同志在浙东三北地委第二次扩大会	
上的总结(1944年7月13日)	(295)

史料选辑

王仲良同志在无锡抗日斗争纪事	朱煜鹏(305)
----------------------	----------

无锡各界抗日联合会	邵荣春 董德范(314)
无锡县委召开的庆祝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	王中一(322)
一切听你王先生的	
——顾复兴部受编“江抗”纪事	(324)
筹组县自卫会和开辟渭黄新区	钱 冰(327)
中共无锡县委驻地——无锡棉花巷廿一号.....	董德范(330)
中共无锡县委机关驻地——德仁里巷	庄祖鑫(332)
中共无锡县委秘密招待所——梅村南新旅社	朱煜鹏(334)
无锡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嵩山寺 ...	许海泉(337)
三北抗建工作推进会首次召开委员会	
(载 1943 年 9 月 25 日《时报简讯》)	王 仿(339)
三北姚山自卫队收复皇山桥据点	
(载 1943 年 10 月 2 日《时事简讯》)	(341)
争取二旅张俊升部北撤经过	朱人俊(342)
王仲良主持中科院上海分院十年科研工作	
取得的成绩	巴延年(348)
千磨万击还坚韧	
——记王仲良同志的一生	朱志豪(352)

历史照片选辑

中共三北地委《关于今年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

(原件局部)(1943 年 8 月)..... (393)

三四五支队总办事处关于召开三北军民庆祝新四军

浙东纵队成立大会的通知(1944 年 1 月 8 日)..... (394)

慈镇姚虞办事处训令(1944 年 3 月)..... (395)

三北自卫总队捷报(1944 年 3 月)
 (396) |

三北军民全面大破袭(1944 年 8 月)
 (397) |

王仲良分析目前敌伪动态(1945 年 5 月)
 (398) |

王仲良谈国民党当局罪恶活动(1945年5月30日)	(399)
三北地委、三北自卫总队驻地密大昌旧址	(400)
三北地委驻地周家大屋旧址	(401)
三北地委、三北自卫总队驻地金仙寺	(402)
三北地委、三北自卫总队驻地盐仓基大房子旧址	(403)
三北地委、三北自卫总队驻地七间头旧址	(404)
三北地委、三北自卫总队驻地五磊寺	(405)
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在道林耶稣教堂成立旧址	(406)
王仲良为三北慈溪市革命烈士陵园题词	(407)
编后记	(408)

真正的共产党人(代序)

《王仲良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怀着敬仰和激动的心情,历时两年,完成了《王仲良纪念文集》的征稿、编辑和出版。

顾名思义,文集重在纪念。仲良同志在战争岁月留下的几篇遗稿,弥足珍贵;战友们情真意切的缅怀之作,弥足珍贵;科学家们由衷的赞叹,弥足珍贵。唯其珍贵,更显文集的厚重。

曲折的经历,艰辛的磨砺,繁重的负担,太多的苦难,这一切集王仲良同志于一身,贯穿于他四十七年卓有建树、颇多贡献的革命生涯之中。

(一)

王仲良投身革命,缘于他的刚正不阿。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灭绝共产党人。其时,在上海以制作金银首饰谋生的王仲良,透过血雨腥风默默地观察着、思索着。有人想利用他在同业中的声望,几次三番拉他领头组织御用金银业工会。他被缠烦了,反问来人:“既然你们将那么多工人杀的杀关的关,还要工会做什么?”

一语定终身。从此,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死对头、掘墓人。

一语见真情。从此,他被当时已转入地下的中共上海组织视为

同志。

从28岁到37岁，即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美好年华与脚镣手铐相伴，坐牢七年有余。非人的囚徒生活，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狱外的妻子则因生活无着、幼儿饿死而悬梁自尽。可他却把牢房当作了战场，当作了“我的大学”。

他在第一次坐牢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时，沉沉黑夜，革命正处于低潮，胜利的希望渺茫。狱中入党，无异于笑迎屠刀献青春。这是何等的可贵！

他第二次被捕，关押于南京陆军监狱长达六年之久，正好相当于他童年时代在浙江余姚老家读私塾的时间。在狱中，他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又向关在一起的留学生难友学习日语，自诩为“监狱大学毕业生”。

在这里，他是监狱党秘密组织的“难友会”的负责人之一，一次次缜密组织指挥难友进行斗争。

在这里，他手攀铁窗，目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蒋介石直接过问的“重犯”恽代英同志唱着国际歌从他的牢房前走向刑场。事后，他联络难友，在各自的牢房中举行了哀悼活动。

在这里，他接受了即将就义者在狱卒厉声催促“快走”时从容脱下的、带着体温的夹袍和几本小册子，默默地应承了对方以千言万语凝成的两个字的嘱托：“珍重”！

在这里，他联系难友们的思想实际，联系大家亲眼看到的正反面典型人物，一次次讨论“什么是壮烈行为”？“为了免受酷刑和牢狱之苦而自杀值得不值得？”同大家一起树立了正确的“生死观”、“苦乐观”。

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熟读从狱外秘密传入的进步书刊和党的文件。

六年后，当他走出监狱，无家可归，形销骨立地出现在上海的亲朋面前时，人们都认不出他了，生怕一阵风把他瘦弱的身子吹倒在地。他很快就又接上了党的关系，建立起由煤业、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联合组成的苦力工会，投入了新的斗争，以他的行动写下了“百折不挠”四个大字。

1940年秋天，在江苏无锡北乡蔡巷，王仲良又一次被捕。与上两回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落入了“忠义救国军”之手。其时，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苏南特委委员、无锡县委书记，统辖着澄（阳澄湖）、锡（无锡）、虞（常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有着满肚子的机密。面对敌人的逼问，他连“王承业”的化名也没说，一口咬定“我是教书先生。”可是此前在与敌不期而遇的紧急关头，那位怀揣枪支、文件听从他的吩咐飞快脱逃的警卫员回身打了一枪，致使助纣为虐的卖国贼们料定“逮着了一个带卫士的共产党重要干部”。

血肉之躯，怎经得住扁担来回的劈打？残暴的敌人又给他“坐老虎凳”，朝着他被捆绑成直角形的脚后跟下面塞砖块，一块又一块，他几次昏死了过去。敌人一次次的酷刑，打断了他的脚骨，折磨得他遍体鳞伤，可就是撬不开他的嘴。他奄奄一息，动弹不得，被扔进一间草舍，严加看守。

外敌入侵之时，固然不乏民族败类的出现，但也有更多良心不泯的同胞。一个奉令对王仲良执行枪决的敌区队长，佩服他的铮铮铁骨，为他火一般的爱国热忱而感动，悄悄地向他出示了“忠救”头目张鹤亭命其就地处决的手令，表示愿为他向外传递信息，以便营救。王仲良还从那位有正义感的区队长的话语中得知敌正阴谋拿他作为交换的筹码。他一听急了，忍着剧痛，写了一纸短笺，请区队长派可靠的人密送“江抗”。信中表示，宁可牺牲自己，绝不能有损党的利益。王仲良同志在身陷魔窟、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利益，拒言营救，这一可歌可泣的事例，充分表现出共产

党人为革命事业宁死不屈、英勇献身的崇高品质。

当时，新四军“江抗”东路指挥部领导人何克希、张开荆同志正亲自组织指挥一支“突击队”，设法营救仲良同志。由于组织计划严密，里应外合，“突击队”一举从“忠救”的掌心中救出了“土地复耕”的开拓者——王仲良同志。

(二)

无锡人民爱称王仲良同志为“土地复耕的开拓者”。

太湖之滨的澄锡虞地区是我国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何须复耕？何须开拓？那是1938年的春天，王仲良同志遵从党的决定从上海来到无锡，肩负开辟无锡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任。这里没有党的组织，没有一支枪，就连一个可靠的立脚点也没有。当时，攻占了京沪杭长江三角洲的日寇正到处推行伪化统治，汉奸、伪军的势力迅速膨胀。中国军人倒是有，单单无锡一地，便有三五千人之众，且装备精良。可他们绝少有抗日的，不管挂的是什么招牌，打的是什么番号，老百姓统统称之为“游吃队”。这样的一幅无锡敌后的情景，岂不是撙荒了的土地？而王仲良同志正是在这里复耕、开拓了整整三年！

那支营救王仲良同志的突击队是临时从各部队抽调人员组成的，其中有他寻觅已久的失散多年而重新接上关系的老同志，有他教育培养介绍入党的年青党员，有他团结改造争取过来的坚决走抗日之路的一支支队伍中的指战员，有他从城市里动员输送入伍的进步青年……他们是噙着泪水将累累伤痕的仲良同志抬上用门板代替的担架的。可以说，突击营救的成功，便是他三年如一日，不避斧钺，精心耕作，勇于开拓的回报。撙荒的土地重又变得葱绿可爱、生机盎然了。

当年仲良同志衔命前往无锡时，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曾经笑着对他说：“这次是要你去做杨靖宇。”仲良同志知道，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由党组织从河南派往关外的。他深刻领会了领导同志语重心长的含意，他没有辜负党的期望。

1941年10月，他肩负“打回老家去，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使命，迈着因伤残行动不太灵便的双腿，偕同继妻、党的机要工作者上官友兰，从杭州湾弃船登岸，踏上了沦陷不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北”平原。此时，他又想起了已经壮烈殉国的杨靖宇。面对家乡，他默默发誓：“我的生命属于党。”没想到的是，他的妻子上官友兰，抵“三北”不久，竟因积劳成疾，长眠在他的家乡了。而他在匆匆料理了爱妻的丧事后，依然顽强地战斗，忘我地工作。

“三北”，是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的简称，相互毗连，濒临杭州湾和东海，处于沪、杭、甬三角地区，水网交织，盛产粮、棉、盐。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物产，决定了这一地区是坚持浙东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是我军向南发展的跳板和依托。正如华中局和陈毅军长反复强调指示的：“必须首先在巩固三北敌后地区的条件下，才能在四明、会稽作敌、顽、我长期性的三角坚持。”王仲良同志在斗争极其复杂艰苦的三北地区战斗、工作了整整四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部队奉命北撤。正如原浙东区党委书记、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同志所说的：“仲良同志在坚持三北地区斗争、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始终是三北地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核心，参与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逐步扩大、巩固的全过程，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工作中从三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有创造，功绩卓著。

他以极大的精力做好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着“广交朋

友，少树敌人”，他与上层士绅名流、官宦富商等等的头面人物促膝谈心，结为知交；他努力争取“两面派”，广泛接触三教九流，化消极为积极，促使这些人为抗战服务。他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大力展开分化瓦解敌伪军工作，争取多批伪中警和日军的携械反正，投奔我军。他教育干部战士和每一个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人人都来做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在坚持党的阶级路线的同时，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在三北地区实行“二五减租”时，有的地方工作同志出于对贫苦佃农的偏护，在秋收议租、交租季节，找一些土质差、产量低的稻田，作为交租估产的标准田；而在交租时又默许农民所交租谷以次充好、短斤缺两。仲良同志发现了这些情况，立即予以教育和纠正，要求有关人员必须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既要坚决维护佃农的利益，也不能有损地主的合法收入，以免影响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他还要求把这个道理向农民讲清楚。

日伪军下乡抢粮，经常遭到我军痛击，落得个伤亡一大堆，一粒粮食也没抢到的结果。可是，总也有几次抢掠得逞。有的领导干部便埋怨群众胆小、落后，声言谁拿出一粒谷子给敌人，就要找谁算账。王仲良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会给群众造成很大压力，影响军民团结。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教育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军民合作，开展反抢粮斗争。

有一年，三北地区大旱，江河断流，池塘干涸，庄稼绝收，广大群众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偏偏祸不单行，数十里的范围内又发生了瘟疫。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日日有人死，村村闻哭声。仲良同志心急如焚，亲自召集当地人士共商对策，说服大家利用“迎会”的传统习俗，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并要到会的乡长回去后主动向伪军、伪政府的头头脑脑打招呼。他料定日伪军不敢进入疫情蔓延的地区，可保“迎会”无虞。经分头准备之后，“迎会”如期举行。疫区群众倾

村而出，部队和地方的医务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将“迎会”变成了群众性的宣传防疫活动。接着，他通过地方绅士从上海筹划来的大量针药也及时运到，白天连着黑夜，远近的男女老幼都打了防疫针。

事后，慈北一带的群众夸说王政委救护了一方百姓，胆大心细，料事如神。王仲良却赶着慰问医生：“你们救了千百条性命，胜造千级浮屠。”

上述的三个事例，比之于他呕心沥血地组建扩大三北地方武装，不断给主力部队输送兵员武器，一次次地精心组织指挥战斗，广泛发动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清乡”、“扫荡”，夺取反顽自卫作战的胜利，以及从无到有地逐步建立完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保障全纵供给任务的完成等等，都只能算是具体小事。然而，透过这些不难看出仲良同志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精髓的人。

(三)

实事求是，谈何容易。有的人一辈子做不到；有的人则往往在位高权重时见风驶舵，趋炎附势；有的却因名利地位，一叶障目，将实事求是抛到九霄云外。早在建国初期，1952年的那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身为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党委委员、卫生部政委的王仲良同志，开始时以教育者首先受教育，整人先整己的积极态度投入运动。他自思入城后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传统，双手是干净的。但担任现职已有四年之久，南京、上海解放后，又做过华野后勤部接管委员会的秘书长，摊子很大，权力也很大，是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好好“洗个澡”。

孰料，上级竟给卫生部下达了“打出‘老虎’多少个”的“指标”，

规定了限期。仲良同志不愿违心地照搬照办，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随着运动的发展，领导坐镇压指标、逼供信等等不良现象接踵而来，搞得人人自危。他又一次次地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势必造成扩大化、伤害了我们的干部。于是他便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始则被扣上“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帽子，继而步步升温，“揪出大老虎王仲良”的“捷报”满天飞。他先是被停职审查，过后又受到了撤职降级的严厉处分，次年脱下军装，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许多同志为他鸣冤叫屈，愤愤不平，而他又总是一句话，“党内的事，受点冤枉算了，历史会作出证明的。”

可是，不等“三反”结束，事实就证明了，压指标、“打老虎”是荒谬的。仲良同志在对待党内受冤屈问题上的正确态度，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信赖的表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是来之不易，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终于在他逝世以后得到恢复和发扬。仲良同志倘地下有知，也会为此倍感欣慰的。

有的人往往戴着“左”视眼镜来看仲良同志的为人处事，说他一贯“右倾”，“向资产阶级分子妥协”。可在群众看来，仲良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是尊重爱护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的十年，是他革命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同战争年代一样光辉的业绩。特别是那些在50年代初从海外归来、一心报效祖国的科学家们，每当抚今追昔，为自己在科学道路上虽然历经坎坷，但还能适应时代不断迈进而感到欣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的党委书记王仲良，进而发出由衷的感叹：“我是幸运的，一回国就遇到了这样的领导。”

他们的篇篇回忆，催人泪下。

“直道不容于时”。^① 仲良同志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可他那刚

^① 语出宋苏轼《三槐堂铭》。

直不阿的秉性，又总是说不出违心的话，做不了违心的事。他屡屡劝导科学家们，你们的主要精力、主要时间应该用于科学研究，不能什么事情都去搞深搞透搞彻底。他冲破重重阻力，不顾种种非议，教育、培养、发展包括彭加木在内的大批优秀科学工作者入党，鼓励他们在科研的主战场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认为不可主次不分，不能样样都当积极分子。为此，他殚精竭虑，谋划万全之策，为科研工作者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创造良好的条件。他反复叮咛所属各研究所党组织的负责人，务必划清政治与学术问题的界线，切切不可代替科学家作什么学术争议的结论。他处处身体力行，积极倡导“为科研第一线服务”，“服务好就是领导好”。他对知识分子关怀备至，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亲自为科研人员跑粮食、跑副食品供应，切实督促行政部门办好农场。就连装日光灯、添置课桌椅、打开水、灭臭虫一类的事他都关心到了。他腾出了自己的大套住房搬进小套，带动别的干部让屋，解决了一批中青年科学家结婚无房的困难。他甘愿自己喝粥，省下粮票送给身体差、家庭人口多的科学家，甚至把家乡亲人特地给他捎来的一点大米也送了出去……

这时他年逾花甲，且身有伤残，要说照顾，仲良同志是应该首先受到照顾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当时肉类奇缺的情况下，居委会曾经给他送去了一只香肚。他推辞不掉就将香肚转送给了“更需要补充营养的人”。夜深了，他从分院回家，路见有的科学家还在公交车站候车，便要驾驶员把他们接上来，先送他们回家。

上述种种言行，固然难能可贵，但比起他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岁月里，始终承受着保护无辜科学工作者的重荷来，更使我们深深地怀念着仲良同志的“功德无量”。

是他甘冒风险，据理力争，担保一个埋头干科学工作的同志“决不是什么‘胡风分子’”，使这位科学家幸运地避免了一场“飞来